

20世纪中国民族学
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凌纯声 芮逸夫◎著

AN ETHNOGRAPHIC
REPORT ON THE
MIAO PEOPLE IN
THE XIANGXI AREA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XIANGXI MIAOZU DIAOCHA BAOGAO

凌纯声 芮逸夫 ⊙ 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12

ISBN 7-105-05975-3

I. 湘... II. ①凌... ②芮... III. 苗族—民族文化—调查报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33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文 精

副主编：王建民 毛公宁 王铁志

编 委：文 精 毛公宁 王铁志 王建民 祁庆富

张海洋 黄显辟 宋 全 关 凯 滕 星

著者告白

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付印。越一年，排校已毕，适值太平洋战事爆发，上海沦陷，未克印行。胜利以后，幸未散失。惟本书写成于二十八（1939）年，应予修订之处颇多；但因已经制成纸版，无法再改。又本书原拟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现以物资缺乏，仅能改用报纸，所有铜版插图，纲目较细，难于清晰，幸读者谅之！



总序

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自1903年林纾、魏易译出《民种学》之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逐渐开始被中国人所接受。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成立，使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立起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成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也开展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学者迁移到西部地区，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形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高潮。20世纪50年代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台湾学者对南岛语族族群和汉人社会展开了研究；大陆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和干扰之后，几代学者在学科重建和建设做出了辛勤的努力；香港人类学学科得以创建和发展。在曲折的学科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当代学人进行反思和总结。同时，国外学者也通过实地考察或文献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著作，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与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互动。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有进一步繁荣之势。近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在重新检讨学术史的过程中，不再把历史回顾看成是成就和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更将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学问题来讨论和认识。对于学科史的



总结和认识，将会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及其再建构。然而，对于学科发展的历程所作的总结刚刚开始起步，许多学者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经验与教训，知之甚少。由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些学界同仁可能会对前人相关的著作较为陌生，在学术分析中没有条件去认真而系统地研读前人著述文本，更谈不上在学科史方面为更广泛而有深度的民族志探讨和理论建构提供有效的素材。对于训练专业人才、培养学术队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本丛书按照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 20 世纪的百年发展历程，收集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中优先编辑出版那些学术意义重大但现在流传较少的论著，以文献为依托勾画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和概况，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基础性的必读之书。“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以收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重要研究成果为主要宗旨，由丛书编委会策划并选定备选书目，民族出版社组织出版。民族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侧重民族类图书出版，承担着为民族研究提供专业背景知识的责任。我们试图通过本丛书及本社最近编辑的几种丛书的出版，推出一系列民族出版社的名牌图书，展现民族出版社的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专业定位和公众形象。

本丛书计划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选编：

一、原著部头较大的著作，采用原著重新再版的办法编辑出版。编辑中在书前加相关学者的导读文章，对该书的撰写、出版、流传过程进行介绍，评介书中的主要学术观点，说明其意义。文中在需要的地方附加注释。

二、原著部头较小的几篇合编为一册。其中既包括不同作者的几部研究相似区域或族群的著作，也可以包括同一作者一些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中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重点文章，按照专



题选编出版。书前加相关学者综述性文章作为导读，说明这一专题的研究状况、研究中的成就及其不足，阐发编辑出版文集的意义。文中在必要的地方加注释。

编委会聘请了对所编辑的经典著作有较多了解，较为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导读文章。尽管导读文章只是相关学者个人的见解，但希望能够从不同角度提供一些背景性知识和学术见解，以对读者有所启发。当然，读者应当以原著研读为主，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课题，完全可以对同一部学术著作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角度。

本丛书编委会

2003.12

总序



导 读

王建民 麻三山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凌纯声、芮逸夫作为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对湘西苗族进行田野调查、开垦湘西民族学处女地的学者。他们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成为了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当时和后来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凌纯声（1902—1981），江苏常州人。字民复，号润生。1919年东南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任附中教务主任。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莫斯等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边疆教育司司长、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和系主任。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撰有《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等职。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方面，曾于40年代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索中国古代文化和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研究范围和运用资料逐步扩大，举凡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材料均能兼容并收。先后撰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

导
读



告》、《中国边政制度》、《边疆文化论集》、《中泰文化论集》、《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笈弋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国与大洋洲的龟祭文化》、《中国连续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专著及数十篇论文。

芮逸夫（1898—1994）江苏溧阳人。前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1930年起先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助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助理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央大学边政系教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8年去台湾，次年春兼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该校考古人类学系成立，改专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主任，以后历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研究主任、台湾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教授。曾先后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访问研究或担任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研究涉及民族学理论和中国各民族文化，对中国古代亲属制度、中华民族构成等课题有较多研究。著有《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论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人类学辞典》（主编）、《苗蛮图集》等。

1933年5月初，为了摸清湘西苗族的实际状况，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受蔡元培的委托，从中央研究院前往湘西的常德、沅陵、泸溪、永溪（今花垣县）、乾城、凤凰等地，对当地的苗族进行调查，实际调查集中于凤凰、乾城、永溪（今花垣县）三县，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他们深入湘西苗族地区，走大路、踏水路，走万丈深渊的山间小道，访遍了那里的村村寨寨、城镇码头，对当地苗族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于同年8月离开湘西。在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对湘西苗族的调查过程中，在当地人尤其是当地苗族学者石启贵等人的协助下，他们三人进行了分工：凌纯声负责苗族地区的地理和苗族的生活、习



俗、鼓舞等方面的研究；芮逸夫负责语言、歌谣和故事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勇士衡专事照相、拍摄电影和绘图等。

事后，又由当地的苗族学者石启贵等进行了补充调查，丰富了调查成果。1939年，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写成了他们的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由于日寇侵华，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出版。

这部著作较为深刻的反映了当时湘西苗族的社会情形和文化状况，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描写了湘西苗族所展示出来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特征及与汉族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种种文化活动。然而，这种差异却是建构在“苗汉同源”的理念之上的。凌纯声等人认为，苗汉在民族起源上、在文化上是同源的、同一的。苗、汉在很多方面如传统节日、风俗、习惯、身体特征上，具有相同的根源，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民族大同论”、苗汉“民族同源论”、“文化同源论”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苗、汉族之间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上面。在这里，湘西苗族的特征更多的是体现在它在文化上极为鲜明的“苗性”及汉族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差异极大的“他性”上面。正是由于湘西苗族文化的这些特色和特殊性，比如房屋、聚落、婚姻、服饰文化、宗教文化、祭祖、舞蹈、图腾、接龙、五谷鬼和苗族的“巫术”等，使湘西苗族鲜明的特性得到了体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凌纯声等人极少调查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也很少去关心湘西苗族的人类种族、身体特征等，只关心湘西苗族的文化，关心对湘西苗族的调查、资料搜集和描述问题，聚焦于展示和挖掘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苗性”和“他性”。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全书分为12章，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



长达 470 多页。在著作的开头部分，结合了中国的古代文献和历史资料，采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凌纯声等人对于苗族的起源、分布、名称及其演变、历史沿革等进行了研究考证，说明了苗汉经过历史上几千年的兴衰、演变与融合，他们在民族起源、在文化根源上是同源，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在这部分当中，他还简要介绍了湘西苗族及其分布、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自然社会环境，说明了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历史状况，揭示了湘西苗族地区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暴乱的原因；然后是著作的第二大部分，即湘西苗族的婚姻家庭、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服饰等各章。在这部分中，凌纯声等人通过对湘西苗族的家庭生育、婚姻制度、社会教育、苗官汉官、屯卫设置、地租赋税、司法状况、饮食服饰等的调查描写，大体说明了苗族的相关社会状况等；之后进入了著作的第三大部分，也就是整个《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的核心部分，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苗族的宗教与巫术、故事、歌谣、鼓舞、语言和游技等各章，是凌纯声等人对湘西苗族文化特质的精心描写部分。在这部分中，作者通过采用多种手段，如苗族民间文物搜集法、逼真的实地摄影法、形象的实物素描及精确的文字说明等，通过实地参加苗族的各种文化活动，亲临现场进行观察体验等，对湘西苗族的宗教、巫术、神话、传说、图腾、歌谣、音乐、鼓舞、语言等进行了特别深刻、非常细致、十分生动的描写记录。他们的描写保持了被描写对象的原始风貌，注意尽量做到描写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客观性，这样，使他们对文化的描写极为鲜明、十分生动，很富有现场感和逼真感，这个部分就占了全文的大部分篇幅。凌纯声等人通过这种描写方法，使湘西苗族极富特色的浓郁文化得到了十分深刻、生动、活泼的再现。

作者在谈到苗族鼓舞中的圆手鼓舞时作了如下描述：男女均舞。男子舞法：右手击鼓，两足相距约七十厘米，又可分为小圆



手与大圆手两种：小圆手，面向鼓，两足做前状，左手曲举至头高，手腕旋转做小圆圈，左右互换；大圆手，面也向鼓，左右两足摆成平状。手伸直，旋转肩部做大圆圈，手旋转至头高而面向外。女子舞法与男子相同，惟手旋转做圆圈而已。通过这样细致的描写方法，凌纯声等人不仅搜集了湘西苗族民间鼓舞的很多种打法，而且具体到了观察记录每一种鼓舞的打法、套路、花样、姿势等，精确到每一个动作的小小变化及幅度的大小。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苗族民间文物的搜集、实物拍摄或素描画图、详细的文字注解等，对这些苗族的文化活动加以说明。

又比如对于苗族的宗教活动来说，对于苗族的各种宗教活动，凌纯声不仅要亲自参与，来到现场，自始至终参加仪式活动的全过程，亲自观察、体验感受各种宗教活动全过程、各阶段所发生的细节、祭师的各个动作、姿势、周围人的反映、周边环境的变化等等，对于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各种祭品、场所的摆设、巫师的祈祷、咒语与神辞等，他都要认真的进行观察访问，详细记录。对于各种实物资料，如供品、法器、各种神像、崇拜对象、字画、文物等，他们都要广泛搜集、绘成图画、进行摄影，甚至拍成电影，予以详细的记载。

采用了类似的手段，凌纯声等人对苗族宗教中的苗教、客教和巫术等种种仪式，如苗教中的祭祖、吃猪、赎魂、洗屋、洗猫儿、吃血、超度亡人、五谷鬼、接龙、暖牛笼等，客教中的土地、飞山、祭天王、鲁班、架地桥等，苗族巫术中的画水、放蛊等，都做了极为鲜明、生动、详细的刻画描写。类似的对湘西苗族文化活动的记载，成为了凌纯声等人著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总体来说，《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调查聚焦于湘西苗族文化。凌纯声、芮逸夫等在湘西调查时，社会动荡，局势不安，当时国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歧视、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问题，而在地处边远的湘西，当地



苗族所受的民族压迫、剥削和歧视较为深重，生活极为穷困，社会地位低下，政治处境极为悲惨。当时，这里苗汉关系十分紧张，经常发生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和纠纷事件。当地民众都强烈要求解决这种紧张的民族关系，解决社会冲突纠纷，并希望被他们视为“中央大员”的凌纯声等人能在调查中反映出这些问题。而凌纯声等人来湘西调查时，只关心文化问题，关注于学科的建设发展，对于湘西苗族当时的社会情形、政治状况、经济生活等很少反映，对于湘西苗族的政治地位如何改进，民族平等如何实现，如何才能生存和更好的发展等现实问题更是极少关心，而是专心于学术研究，只关心对湘西苗族文化的调查和展示问题。作为在西方学术体系中训练出来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等人的做法正与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时所奉行的纯为求知作研究，所事研究多不涉及应用的研究方针相符。^①

其次，调查十分细致、深入，内容较为全面、系统，符合学术规范。凌纯声等人在对湘西苗族的调查过程中，特别强调调查的细致性、深入性，表现出了对以细致著称的法国式田野调查法的偏爱，讲求不厌其烦的细致调查。比如对于苗族的文化活动，他都要亲临现场，自始至终参加整个仪式和活动的全过程，对于所发生的活动的具体细节，一举一动，影响因素等，都要进行仔细观察、体验和记载，并做好文物搜集、实地拍摄、素描画图、拍摄影片，同时还附上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力图准确地展示出所描写文化，增强所描绘文化的现场感和逼真感。他们的调查较为系统，内容十分广泛。他们的调查涉及了湘西苗族的地理、住所、分布与发饰、饮食、衣服、生产方式、音乐、贸易、政治情形、司法与社会情形、婚姻、妇女地位、生与死、宗教祭祀与神

^① 参见王建见：《中国民族学史》上册，263~276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话、图腾、医药、时间等问题。在湘西实地调查时，参照详细的提纲进行调查。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苗族的地理环境、生存条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他们这种细致深入的调查方法，保证了所取得的调查资料全面可靠，对文化的刻画描写更为具体、生动和活泼。不过，凌纯声等人对湘西苗族的调查，对苗族的衣服、住所、文化活动等外在的物质文化现象和活动描述较多，而对于湘西苗族的价值观念、人格特征、情感世界等内在精神文化涉及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与此同时，依照他们当时的学术理念，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很少对调查资料进行理论分析，也没有试图从中推演更普遍的学科理论。

第三，重视历史资料、地方文献与田野调查的结合。凌纯声等人在湘西调查时及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都很重视对历史资料的利用，他们不只强调共时性调查，而且也很注重历时性调查，能在研究中做到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机结合。比如在著作中，凌纯声就引述了大量古代文献，如《史记》、《尚书》、《后汉书》、《左传》、《溪蛮丛笑》、《元史》等，对于苗族的起源、名称变化、苗族的分类、地理分布、迁徙及文化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他的历史色彩较为浓厚的历史研究风格。

要更清楚地认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这些特点，必须考虑这部著作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凌纯声等人到湘西调查时，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国门被迫打开的时代。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和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其中很多人就到了中国内地的民族地区。他们在从事传教、研究和探险活动的同时，就对这些地区的民族状况进行了考察，对这些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等等进行了调查。这样，产生出了许多部头不小的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1902年至次年3月，国际学者、著名



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的派遣，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了探险调查，归国后写下了巨著《苗族调查报告》，在国际学术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中国的学者自身在这方面却拿不出有影响的论著。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学术界震动很大，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今日之国人皆醉心于民族复兴之谈论，但对自己国内民族之认识，却又极端隔膜。西南民族为中华民族中的一系派，过去国人对西南民族谬误之传统的恶见解固无论也，而今日言民族之统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几人亲身到西南民族集团中做实地之调查研究？反之，外国却有花毕生精力，冒最大的危险，往我国西南腹地做实际考察，考察报告这一类书籍，在国内如凤毛麟角，在欧美以致日本学术界中，却有不少专门论著，这不仅为国人极大耻辱，且为民族前途极大之危机。”而令中国学术界极感羞辱的是，当时国内学术界却拿不出在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来。这就激发了国内学术界的自强精神，促使他们到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力求写出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以提高中国的学术地位。当时湘西苗族地区尚未有人调查过，作为有待于开发的一块民族学研究处女地，对国内的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基于此，中央研究院组织了对湘西苗族的实地调查。同时，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内容与重点、学术观点和民族志写作风格等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国外学术著作的明显影响。

凌纯声等人所在的时代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学派引进中国的时期，人们在探讨如何将西方学术理念与中国治学传统相结合。西方民族学的众多理论学派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到国外留学，接受了西方学术传统的系统训练和导师的影响，这使他们在学术上具有极为浓厚的西化倾向。同时，这些中国学者又生长在中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熟悉中国的历史状况。在研究中善于利用中国



的地方文献与历史资料，形成了具有浓厚历史学色彩的“中国历史学派”学术倾向。^① 凌纯声早年留学法国，师从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大师莫斯（M. Mauss, 1872—1950），受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深受法国民族学派的影响，形成了较为注重实地调查资料、注重资料搜集的研究风格，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西方理论学派的“不以理论代事实，不以一般代特殊，不以部分代整体，按步深入，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和“宁愿为事实而牺牲理论，决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的精神。^② 他主张“民族学研究的是普遍文化的原理，而民族志研究的是特殊地方和特殊民族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文物和制度。”^③ 他对法国民族学派的以细致称著的实地调查方法十分偏爱，讲究不厌其烦的细致调查，调查要全面、系统、真实，讲究调查方法。他们的调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广泛，力图求全，很讲究调查提纲在调查中的重要性。凌纯声指出：“实地调查不论有没有经验，调查问题表格必须携带……初次赴实地调查比较稳健些还是多依据问题表格，后来实地调查经验增加，尽可增损活用。”^④ 他们的调查提纲十分细致，并按照这些表格有所损益进行调查。凌纯声等人这种深入细致的民族学调查和描写方法，体现了凌纯声等人深受西方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凌纯声等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熏陶，

① 参见王建见：《中国民族学史》上册，145～16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② 杨成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译序》，载弗兰克·鲍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③ 凌纯声：《民族学与现代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873号，1932年12月21日。

④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1）。